

我们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在学生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是以**尊重**的方式还是**干预**的方式进行教育的?这两者形式上虽有交叉之处,本质上却完全不同。

有句老话说道:鸡蛋从外部打开就是食物,从内部打开就是生命。当我们判断某个具体的行为是真正的教育活动还是一个粗暴的干预,重要的要看是否**尊重**了学生的个体,是朝着优化的方向去发展人,还是一味地依据教师的观点去强迫人?这也是教育的文明与野蛮的重要分水岭。

很多教师觉得工作非常忙,为什么这么忙?他们认为除了日常的教学工作以外,还要应付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更要管好班级的学生。吃饭要管,上厕所要管,作业不完成要管,似乎所有的都要老师去管一管,不管就是不负责的表现,不管就不是一个好老师。

笔者认为:一个好教师绝不是“管家婆”。儿童的小学教育从六年的时间长度上来看,应该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自我调整、逐步适应的过程。教育,应该让儿童逐步在认识自我、多元选择中,学会调整自己内在的生长模式。**儿童成长的进化,就是教育方式文明的体现。**

四

杜威先生一再强调,要培养儿童的社会能力和洞察能力,要让儿童循着历史上人类的进步足迹前进,立足当下,了解过去,还要适应未来。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语文课要让学生体验到文字的味道及汉语的独特魅力;数学学科要让学生感受到公式和定理的简洁美和精确美;科学学科要让学生认识到人类追求技术的改进、获得真理的历程……我们不能将所有学科的知识零碎地掰开来喂给学生,只有**穿越知识本身,让他们发现知识,进而创造知识**,他们才会真正成为人类文化的传递者,教育的文明才能得以体现。

阅读大师,更是获得思想的启迪。教育的文明进程,需要的不是隔岸观火者,而是思想者和行动者。

(王天锋,扬州市梅岭小学西校区,225200)

责任编辑:宣丽华

DOI:10.13696/j.cnki.jer.1673-9094.2016.z5.041

中国古代众多的蒙学教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号称“**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其中尤以《三字经》影响最大。《三字经》相传是由南宋名儒王应麟编撰的,也有称其编撰者为宋末区适或明代黎贞之说。《三字经》自成书后,很快成为中国古代流传范围最广的蒙学教材。清王朝曾规定,儿童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必须先读《三字经》。历史上流传过的《三字经》增补、注释、注音、注图、翻刻版本众多,包括将《三字经》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的《蒙汉三字经》《满汉三字经》等等。在国外,《三字经》有英、法、拉丁等多种译本。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选入该组织编辑出版的《儿童道德丛书》,向全世界推荐。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成功典范。从历史层面看,《三字经》的成功主要由于**其集中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内在要求,与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相契合**。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所言:你想在国家里得到什么,你必须在学校里投入什么。国家是什么,学校就是什么。《三字经》中,学习的目的就是“**显亲扬名,光前裕后**”,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上致君,下泽民”,上为君王尽忠效命,下为百姓造福施恩,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致君”。并且,《三字经》中宣讲的“三纲”“五常”正是维护封建社会君权、父权、夫权统治的精神枷锁,是处理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在封建社会中,这样“从娃娃抓起”的精神卫道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三字经》才会盛行,并出现了前文提到的清王朝规定儿童必学《三字经》的现象。

当然,《三字经》中也蕴涵着很多对于**当今**语文教育仍然有着十分积极作用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笔者拟就此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

一、养正于蒙——《三字经》的识字教学理念

《三字经》作为蒙学教材,肩负“**养正于蒙**”的使命,即在儿童启蒙之际施以正当的教育,来启迪儿童的智慧,培育儿童的品德,使之健康成长。所以,《三字经》在编写中尤其注重“识字”与“教化”的统一。

一方面,《三字经》作为专供蒙童习字的教材,识字教学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首先,《三字经》明确了**识字教学**的意义。“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知某文。”学知识就是学会算术和认字。这里,表明了编者对识字写字教学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识字写字教学是阅读和写作的前提,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其质量直接关系着语文教学的质量,还有以语言文字为基础工具的其他学科的教学质量。

《三字经》蕴涵的语文教育观

徐 雁

其次,《三字经》确定了蒙学初步识字量。《三字经》全篇共计1140字,用字数为520字。据有关方面统计,国家语委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表明,在常用的3500个字中,只要掌握500多个常用字,覆盖率就高达80%。《三字经》中选取的是古汉语当中的常用字,儿童耗时不多,即可掌握很大一部分常用汉字,这一识字量的选取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再次,《三字经》的编写符合儿童认知的特点。《三字经》三字成句,两两押韵,节奏整齐,过渡自然,读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同时,教材在编排上用意义识记而非机械识记,对于开发儿童智慧起到了促进作用。经初步统计,1140字的短文中,出现典故20处,如“孟母三迁”“孟母断机”“五子登科”“黄香扇枕”“孔融让梨”“赵普夜读”“编席抄书”“孙敬悬发”“苏秦刺股”等等。这些故事浅显易懂,生动有趣,儿童在故事的具体语境下学习生字,进行意义识记,事半功倍。

另一方面,《三字经》对于儿童的品德教化尤为重视。尊老爱幼、谦逊礼让、守职尽忠、勤奋好学等品质都是其一再强调的。通过感染、内化,从而促进儿童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在《三字经》中,识字教学和品德教化是互为表里、相互统一的,两者有机结合,从而真正实现“养正于蒙”。

二、综合建构——《三字经》的语文教育观

“文、史、哲不分家”的观点在今天仍深入人心。一方面,文、史、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我们学习的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既负载着过去,也传承着文化。因此,语文教育与文化教育本身就无法割

裂。另一方面,文化教育与语文教育是相辅相成的,语文素养的养成,需要深厚而广博的文化积淀。

在短短的《三字经》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文化内涵是相当丰富的。

在语文方面,首先,以《三字经》作习字教材,使学生掌握一些汉字的音、形、义,为其日后阅读、写作等学习打下良好基础,这一点不再赘言。其次,《三字经》全篇使用三言句式,从句法的角度看,其中包罗了文言文里各种基本的句式,既使得语言错落有致,又可以训练儿童的语言能力。例如“头悬梁、锥刺股”“犬守夜 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等等,这种三字句是主、谓、宾主要成分俱全的完整句子,是童蒙学习句子的最佳范例。儿童通过反复诵读,可以培养语感,了解古代汉语的基本语法规范。再次,在阐述儿童蒙学的顺序之时,也传授了一些经典文学常识,比如《四书》的组成、六经的构成,《易经》之合称,“书”的几种体裁,《礼记》的作者与注者,《诗经》的风雅颂,何为“春秋三传”等等。这些当今大学生未必能一一回答的文学常识,古时蒙学童子已了然于心,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最后,在前文中也提到过,《三字经》中出现了众多文学典故,这既可以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同时对于儿童的语文积累也大有裨益。

在历史方面,《三字经》只用三百多字就概括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朝代更迭、帝王兴废的历史,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以史为鉴,以史育人。

在哲学方面,《三字经》主要涉及两点:一是孟子的“性善论”。孟子在《告子上》中有云:“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



不下。”他认为人皆有“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有很多学者指出，《三字经》开篇即言“性善论”，过于艰深，有悖于儿童的认知规律。而我认为这不妨理解作为一种鼓励儿童的教学手段。肯定“性善论”即肯定了每一个蒙学的儿童，让其感受如沐春风的教学氛围，促其形成道德向善的信仰。同时，这对于为师者、为父母者也是一种提醒：一个个涉世未深的儿童，如一张张洁白无瑕的白纸，涂抹什么色彩往往不由他们自主。因此，教师和家长责无旁贷，“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哲学思想的另一体现在于其中的“三纲”“五常”“十义”等封建伦理关系的概括。“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这些都是指导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

在《三字经》中，不仅文、史、哲相结合，更有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的融合，如“三光”“四时”“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等等，各种学科在语文的大课堂里融会贯通，这似乎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对于儿童的知识体系建构起到了引导作用，有利于儿童在日后的学习中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三、循序渐进——《三字经》的教学程序设计理念

循序渐进的教学思想和原则在中国古代教育家的论述中是十分常见的。如孟子在《尽心上》篇中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以流水作比，水满了才会溢出前行，从而说明学习必须一步一步，循序渐进。

《学记》中也曾明确指出：“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意思是说教师教学时杂乱无章，不按教学内容深浅的一定次序，不根据学生的年龄大小和接受程度的高低进行传授，就会把教学的条理和秩序弄坏搞乱，甚至会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三字经》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循序渐进，但其中渗透的这种教学思想却清晰可见。

首先，《三字经》内容涵盖面较广，但编排条理性很强，过渡自然，层次分明。开头先讲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其次讲幼学的内容，再次讲幼学的知识及其顺序，接着讲训蒙顺序，最后讲发愤勤学的故事并予以总结。

其次，在各部分之中，也讲究内容的先易后难，层层递进。如“知某数”就需要“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识某文”也须由“三才”“三光”等简单名物过渡至“九族”“十义”等复杂内容。训蒙也须有一定顺序，小学而后四书，诸子而后经传，“经子通”方可“读诸史”。在《三字经》中，有很多这样的语句，如“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经子通，读诸史”等等，一方面起到了衔接过渡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编者较强的程序教学理念。知识序列的呈现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同时，各知识点又处于一个整体中，具有明显的系统性。这是非常先进的程序设计理念，它符合儿童认知发展的规律，本身即形成相应的脉络线索，有利于儿童的记忆、运用及拓展，有助于儿童的认知建构。这些对于当代语文教学中出现的“知识序列不明确”之尴尬——“初一的学生能学高一的课文，高一的学生能学初一的课文”具有相当的启示：仅在课文长短上设置“分辨率”是不合理的，教学内容更应呈现一种渐进、互补的态势，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循序渐进地学习，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浅显到深刻，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

另外，《三字经》还提到了环境对教育的影响，学习态度等等，在此就不一一论述了。《三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可取之处。笔者以为其仍是当下习字教材的典范之作，固然它也蕴涵着一些封建文化的糟粕，但瑕不掩瑜，我们仍需要批判地继承。

在课程改革遍地生花的当下，不难发现《三字经》中的很多语文教育理念都与新课改的主张不谋而合，如新课改力主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恰恰应和了《三字经》“养正于蒙”的要求；而《三字经》中的综合建构观，对今天变“语文知识”“语文能力”为“语文素养”、注重综合发展、提高人文素质也有重要的启发价值。这种不谋而合并非偶然的巧合，它恰恰提示我们：提倡素质教育，提倡语文素养的培育，不单单是一个名词术语的转换，更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但在创新的同时，我们也应回过头来看一看，其实传统文化教育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之处。改革中，“变”是需要的，但什么是“不变”，如何把握与坚守一些“不变”，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徐雁，南京市第十三中学，210008）

责任编辑：宣丽华